

漢語方言文集

詹伯慧著

龍溪書舍

漢語方言文集

詹伯慧著

龍溪書舍

詹伯慧

1931年、廣東省饒平縣に生る。中山大学語言学系卒業。後北京大学にて漢語方言学を修む。研究の主方向は漢語方言学。袁宗驊教授主編の「漢語方言概要」に執筆。また「漢語大字典」の編纂に参加。著書「現代漢語方言」(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漢人怎樣學習普通話」(同上)、「潯水方言紀要」(龍溪書舍)。その他論文多数。武漢大学教授。現在最初の長期講義招聘教授として来日、東京大学で講義中。

詹伯慧著 漢語方言文集

1982年 3月31日

定価 4,800円

発行者 北村正光

発行所 龍溪書舍

〒101 東京都千代田区神田小川町3-28-7

電話 03(233)0441代表・振替東京3-76123

印刷・製本 日本プリントセンター

目 次

汉语方言文集

[前言]——波多野太郎	1
有关汉语方言分区的一些问题	7
关于汉语方言词汇调查研究的问题	21
谈汉语方言语生材料的收集和整理	39
有关编写《学话手册》的几个问题	55
略谈普通话学习中的“知己知彼”	63
略谈方言和普通话的语法差异	71
粤方言中的虚词“亲住翻埋添”	75
潮州话的一些语法特点	81
海南方言中同义字的训读现象	87
浣水话动词“体”的表现方式	91
潮州方言	95
万宁方音概述	179
海南岛“军话”语音概述	201
广济方音和北京语音的比较	215
鄂南蒲圻话的语音特点	241
郧县方音记要	265
[后记]	301

前言

波多野太郎

我的熟朋友武漢大學教授詹君伯慧，現在千里迢迢渡海來日，在東京大學教書。他的寓所，離我的研究室不太遠。因此時常來來往往談天說地。多年來他寫的有關方言的文章，一共有近二十篇，我瀏覽了其中一部分，就知道很有學術價值。譬如說，他提起粵語虛詞“親、住、翻埋、添”來，細心地引用例子說明，很有見解。從先孔仲南寫的《廣東俗語攷》卻欠缺了“釋語詞”，也沒有續刊著，沒甚麼用的，1966年高硯農在他寫的《廣州話口語詞的研究》，言及這個問題，差不離兄看過伯慧教授的論文。到1972年出版的張洪年寫的《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也引用伯慧教授的说法。張氏說“自來的學者，都認為翻字的用法很麻煩、用法非常複雜，詹伯慧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詳細討論過翻字的用法，”指的就是這篇文章。還有關於潮州話，動詞“有”字，有動賓結構，這個語法，伯慧教授的研究也很

有趣兒。原來伯慧教授早年在中山大學語言學系念書，受王力教授的指導，後來又到北京大學，就袁家驊教授學習方言學。加之他的籍貫是廣東饒平（潮州府屬），本人又掌握好幾種方言，所以研究方言很有根兒。俗話兒說得好：“有其母有其女”真是不錯的！

我想研究方言，一來對研究漢語史，是很要緊的基礎，二來對研究小說戲曲的詞彙，也大有裨益。這麼着，有一天我帶這套稿子去和龍溪書舍編輯部殷橋部長南里主任商量，推薦伯慧教授的論文，他們慨然贊成印一本文集。現在當付印之際，我在這裡向他們兩位負責人表示深切的謝意。

波多野太郎

於臺北本坡滿坡
望胡樓實事求是室

1980年9月



目 次

汉语方言文集

[前言]——波多野太郎	1
有关汉语方言分区的一些问题	7
关于汉语方言词汇调查研究的问题	21
谈汉语方言语生材料的收集和整理	39
有关编写《学话手册》的几个问题	55
略谈普通话学习中的“知己知彼”	63
略谈方言和普通话的语法差异	71
粤方言中的虚词“亲住翻埋添”	75
潮州话的一些语法特点	81
海南方言中同义字的训读现象	87
浣水话动词“体”的表现方式	91
潮州方言	95
万宁方音概述	179
海南岛“军话”语音概述	201
广济方音和北京语音的比较	215
鄂南蒲圻话的语音特点	241
郧县方音记要	265
[后记]	301

有关汉语方言分区的一些问题

有关汉语方言分区的一些問題^[1]

黃家教 詹伯慧 陳世民

一

汉语方言的調查研究在我國語言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丰富多采的地方方言是汉语的特点之一。任何一个認真研究汉语的人，都不可能不接触到汉语方言的問題。無論是靜態地描寫汉语，或者是歷史地揭示汉语的發展規律，如果不參考汉语方言的材料，是很难獲得完滿的成果的。咱們現在从事汉语方言的調查研究工作，既要看到它在今天的作用，也要看到它在明天的作用；既要認識到它在語言学研究中的战略意义，也要認識到它在語言学研究中的战略意义。

我國汉语方言的研究工作，虽然已有兩千年的悠久歷史，可是，第一次全面展开汉语方言的普查，却还是几年以前的事。在1956—1958年間，为了促進推广普通話工作的开展，替汉字改革鋪平道路，并为汉语规范化工作提供科学資料，在党中央的指示和各地党、政、文教部門的具体領導下，勝利地开展了以每縣为一个調查点的汉语方言普查工作，从而積累了空前丰富的方言資料，在这个基礎上，各省（自治区）着手編寫了一些概括全省（自治区）汉语方言面貌的《××省（自治区）汉语方言概況》。这样大規模的汉语方言調查研究工作，給我國語言科学宝庫增添了巨大的財富，同时也在方言工作者面前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像汉语方言的分区問題，就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个。汉语方言的分区問題既是理論問題，也是实际問題，妥善地加以解决，对于進一步深入調查研究汉语方言，無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現在想趁这个机会結合在福建省汉语方言科学討論会中得到的一些啓發以及自己过去在工作中的点滴体会，把我們对于汉语方言分区問題的一些粗淺看法提出來，向專家們和讀者們請教。

二

众所周知，汉语是世界上方言分歧比較大的語言之一。以汉语这样一个拥有將近六億人口，分布在縱橫几千公里土地上的語言，方言比較复雜是不足为奇的。問題在于：在这种方言比較复雜的

[1] 1963年8月12日至17日，我們应邀参加了福建省汉语方言調查指導組、廈門大學、福建师范学院聯合举办的福建省汉语方言科学討論会。这一个會議把討論方言分区問題作为中心的議程，討論涉及方言分区的一系列理論問題，也涉及許多实际問題。本文是在我們參加討論会發言稿的基礎上經過整理加工寫成的。

情況下，咱們作為語言工作者，應該如何面對現實，把各種方言的廬山真面目揭示出來，讓人們知道漢語方言究竟分歧到什么程度；不同方言之間的差異性表現在那些地方；除了差異性以外，是不是還有一致性的一面；還有，漢語各方言實際流通的情況如何；等等。如果咱們試圖解答這樣一些問題，必然就會接觸到如何把各具特色、頭緒紛繁的許多方言歸納成為為數有限的若干類別的問題，即如何劃分漢語方言的問題了。比方說，當我們在調查廣東省內各地的漢語方言的時候，我們接觸到大量的語言事實，我們發現粵東潮汕一帶的地方話，海南島漢族地區的地方話，以及粵東梅縣興寧一帶的地方話，都分別跟廣州一帶的地方話迥然不同，這時咱們就不能不在腦子裡產生如何給這些不同的地方話歸類的問題；同樣，當咱們在調查福建省內各地漢語方言的時候，咱們發現閩南廈門一帶的地方話跟閩東福州一帶的地方話，跟閩北建甌一帶的地方話，跟閩中永安一帶的地方話都有差別，而閩西長汀一帶的地方話和閩西北邵武一帶的地方話又跟福州、廈門、建甌、永安等地的地方話有更大的距離，咱們也就不能不考慮到：福建省內這許多互不相同的地方話究竟應該歸屬於幾個類別呢？如何給它們作科學的分類呢？這樣的考慮是很自然的，也是很現實的，科學的方言分區能夠使人們一目了然地看到每一種地方話在整個漢語方言大家庭中處於什么样的地位，它跟哪些地方話是“近親”，又跟哪些地方話是“遠戚”。一句話，科學的分區能使各地人民清楚地了解自己方言的系屬。同時，從語言研究的需要來說，科學的方言分區還會有利於咱們掌握各地方言的特點，從而因勢利導地促使各地方言向共同語集中，早日實現漢語規範化這一偉大理想。由此看來，漢語方言的分區絕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任何一個認真嚴肅的方言工作者都必須深思熟慮的事情。

漢語方言是客觀存在的，不同方言之間有着“近親”和“遠戚”的不同關係，這也是客觀存在的。漢語方言分區的工作實際上只是把客觀存在的方言系屬如實地歸納出來，並加以科學的說明。這首先就要求任何一個方言工作者在給方言分區時，必須大量占有可以作為分區依據的材料，然後用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來運用這些材料，以達到分區的目的。我們認為，無論在哪一個省（自治區）里接觸到漢語方言的分區問題，都必須首先確立面對客觀事實，不拘泥於傳統看法的指導思想，否則是不難以得到滿意的結果的。

三

分區要面對事實，所謂事實指的是什么呢？方言分區應該以什麼為依據呢？關於這個問題，在這次福建省漢語方言科學討論會上曾經有過熱烈的爭論。总的說來，我們是基本上同意《福建漢語方言概況》編寫小組“以語言材料為依據，而以社會歷史資料為主要參考”的提法的。方言是全民語言的分支，它有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因而方言的分區只能是“語言”本身的分區，只能以語言材料作為主要的最終的依據。離開了語言材料，而以其他材料（如地理條件等等）作為分區的主要依據，就必然會牽強附會，歪曲事實，無法確保分區的科學性。但是另一方面，方言又是一

種社會現象，它的形成和發展都是跟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關的，都可以從社會發展的歷史中找到一定的依據。要為方言合理分區，既要了解它的現狀，又要了解它的歷史，同時，要徹底地了解現狀，也只有從歷史上進行考察才有可能。方言區人文歷史方面的材料有助於我們探索方言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因而在劃分方言時應該得到我們充分的重視。我們在為方言分區時，如果能在以語言材料為主要依據的前提下，適當地參考人文歷史方面的材料，就能更好地弄清方言分區的實質。事實上，客觀存在的不同方言區，正是一方面在語言材料上有顯著的差別，另一方面在人文歷史方面也有其特殊的因素。可是，在貫徹這一原則的時候，如何做到既正確地運用了語言材料所提供的依據而又同時沒有忽略結合人文歷史方面的情況來考慮，使兩方面的配合運用恰到好處，使之相輔相成，達到辯證的統一，這却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咱們給漢語方言分區的結果，總得讓人們既能夠在不同的方言區中看到它們明顯的語言標志，必要時也能夠從人文歷史方面看到這個方言所以自成一區的依據才好。過去幾十年我國語言學界曾經不止一次試圖給漢語方言作合理的分區，先後有過不少的改進，可是，至今咱們還難以完滿地回答出漢語究竟有多少種方言，多少種次方言，多少種土語來。在一些影響較大的漢語著作中，對於漢語的方言分區，也還存在着不同的說法。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過去對漢語方言缺乏全面的調查研究，無法充分做到“以語言材料為依據”；另一方面，過去對於決定方言分區的問題應該聯繫方言的歷史，聯繫使用方言的人民的歷史，聯繫跟方言的形成、發展有關的各方面的人文資料，這一點或是沒有引起重視，或是體會不夠深刻，因而實際運用起來往往無法兼顧，恐怕也是造成分區問題遲遲未決的原因之一。如果咱們能夠雙管齊下，從語言材料和人文歷史兩方面加以全面考慮，如今有了全國漢語方言普查的基礎，分區的問題應該是不難迎刃而解的。最低限度咱們應該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就“漢語究竟分成幾個大方言區”這個問題求得一個比之前人的結論較為妥貼的答案來。

不妨讓咱們簡單回顧一下幾十年來漢語方言分區的情況：最早給現代漢語分類的要算是章太炎了。他在《檢論·方言篇》中把漢語方言分為九種，他劃分時常凭印象，方言面貌的描寫和解釋極不科學。例如說什麼“江南蘇州、松江、太滄、常州、浙江湖州、嘉興、杭州、寧波、紹興，為一種。濱海下濕，而內多渠澮湖沼，故聲濡弱。”像這樣用自然地理的條件來解釋方言的差異，可以說還沒有超出一千三百多年前顏之推的水平。^[1]隨後黎錦熙先生曾依江湖流域的分布把漢語方言分為十二系，也還是缺乏科學的根據，方言的劃分仍然沒有被提到以語言材料為依據的高度上來。^[2]

[1] 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音辭篇》中有一段話談到當時談話方言分歧的情況，純粹用山川地理的條件來說明方言差異形成的原因。他說：“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鈍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

[2] 黎錦熙先生的十二系是：“直隸、山西、東三省、山東、河南北部，為河北系。河南中部，山西南部，江蘇、安徽、淮北一帶，為河南系。陝西、甘肅、新疆為河西系。江蘇北部與江西西部之南京、鎮江、安徽中部之安慶，蕪湖，江西之九江，為江淮系。河南南部，湖北，為江漢系。湖南東部，湖北東南角，江西之南部為江湖系。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北部、湖南西部，為金沙系。蘇、松、常，與浙江

后来王力先生在他的《中國語文講話》中把汉语方言分为官話、吳語、閩語、粵語和客家話五大系，可以說是注意到語言的材料，而不是純粹依照地理区域来划分了。^[1]可是，由于当时王先生还不可能接触到大量的汉语方言材料，对于人文歷史方面材料的掌握和利用也远远不够，五大方言說尽管比章氏的九种說和黎氏的十二系說科学得多，但距离妥貼的要求还是相当远的。众所周知，在相当長的一段时期中，我國語言学界是习惯于暫用五大方言說的。随着語言科学水平的發展，后来人們在語言实践中终于逐漸發現五大方言不能概括汉语方言的全貌，首先是感到把湘方言和贛方言都籠統归到“官話”中不符合客觀語言事实，因此，就有人認為应讓湘、贛兩方言各自独立成系，这样一來，五大方言說就开始动搖了。与此同时，还有人觉得福建省內方言異常复雜，閩南閩北无法通話，“閩語”的提法过于籠統，因而又有閩南閩北分立兩区的說法，最后導致了以八大方言取代五大方言的新局面。八大方言就是北方方言（官話）、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閩南方言和閩北方言。自从1955年10月中國科学院語言研究所丁声樹、李荣兩位先生在現代汉语規範問題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汉语方言調查》的学术报告，正式提出汉语方言可以分为八区，并列舉各区語音特点以后，^[2]七八年來我國許多汉语方面的著作都采用了这一說法，大家无形中已經默認这是迄今为止比較妥善的汉语方言分区了。

然而，当咱們今天站在汉语方言普查告一段落，方言理論水平和工作經驗都有所長進的基礎上，再來重新估价一下汉语方言分区的一些提法时，面对着語言材料和人文歷史情况，咱們就难免會感到五大方言說固然嫌太籠統，就是八大方言說，也还不能說是十全十美的了。从五区到八区，在反映客觀語言事实上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可是，这样的处理在某些地方多少却令人感到过于強調語言的現狀而放松了对于語言歷史和人文歷史方面的注意；过于強調方言之間差異性的一面而忽視了它們一致性的一面。比如把閩方言分列为閩南閩北兩区这一点，根据近几年福建方言普查的材料來看，是很难說得通的：第一，福建省閩方言区内不但閩南閩北无法通話，閩东、閩中同样无法与閩南、閩北通話；第二，福州位于閩东，福州話在閩北不能通行，它只能作为閩东的代表，真正代表閩北的應該是建甌話。由此可見，如果單純从語言現狀出發，強調其差異性的一面，那就不但閩南閩北可以并列为兩大方言，閩东、閩中同样也可以并列为汉语的兩大方言了。我們在給整个汉语划分为若干大方言区的时候，当然應該从大处着眼，而不宜过分注意表面的語言因素的分歧。須知汉语有悠久的歷史，汉语方言發展到今天这样的分歧狀況絕不是偶然的，我們一定要密切聯繫歷史，

之杭、嘉、湖，为太湖系。浙东金、衢、严及江西东部，为浙源系。浙江南部近海处，为甌海系。福建为閩海系。广东为粤海系。”（轉引自王力先生《中國音韻学》下册第288頁，又見《漢語音韻学》第572頁）

[1] 王力先生的分类見开明书店出版《中國語文講話》一书，1956年由文化教育出版社改以《漢語講話》为名修訂再版。

[2] 參看《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学术會議文件彙編》一书，科学出版社出版，80—88頁。

密切注意共同的因素，一致的東西，儘管表面上分歧很大，各個方言之間必然會有其共同的基礎，以顯示漢語作為一個民族語言的統一性。對待表現在各地方話中的種種差異，咱們既要實事求是地充分揭示真相，又要在千差萬別中找出可以作為概括、分類的一致性的因素。只有同中察異、異中明同，才能夠從複雜的方言現象中整理出一個簡明貼切的漢語方言系統來。否則不但閩方言不能歸成一類，就是其它各大方言，也難保不分崩離析，整個漢語的方言，怕不是十區八區所能概括，或許得分成幾十個區了。拿大家都公認的“官話區”（北方方言）來說，它的使用人口近四億人，分布地域占漢語地區四分之三，我們如果不是從大處着眼，實在是難以設想其統一性何在的。要是斤斤計較個別語言因素的話，西安話怎能跟武漢話歸到一個大方言區中，揚州話又怎能跟哈爾濱話攀上親戚呢？近年來各省（自治區）在編寫《方言概況》中都或多或少碰到劃分方言區、確定方言系屬的難題。例如《廣西漢語方言概要》指出廣西的“平話應該獨立抑或應該歸入現有的八大方言中的哪一種呢，這個問題還有待進一步調查研究。”《湖北方言概況》把湖北全省漢語方言分為三區，其中除了以武漢話為代表的一個區在全國漢語方言中的系屬明確以外（屬北方方言區中的西南方言系統），其餘兩個區（“楚語區”和“鄂南區”）的系屬就都沒有明確指出。《湖南省漢語方言總結報告》把湖南方言分為三區，其中第一區屬湘方言，第二區屬北方方言系統，至於第三區處於湘東狹長地帶的臨湘、平江、醴陵等十三縣，究竟在漢語方言中屬於哪一系呢，也還是要打個問號。《安徽方言概況》分安徽省內方言為五區，即：1. 阜宿方言區，2. 肥蕪方言區，3. 銅太方言區，4. 潛懷方言區，5. 歙祁方言區。編者在書中特別指出：“皖南徽州一帶的方言，紛歧的現象更為突出，……這裡的方言究竟應該屬哪個大方言系統，至今還沒有定論。”至於福建省的漢語方言分區，《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編寫組的同志們最初曾經把福建省漢語方言分為閩海、閩中、閩客三“群”，在“群”底下再分閩東、莆仙、閩南（以上閩海群）、閩中、閩北（以上閩中群）、閩北客、閩西客（以上閩客群）等七個“區”，“區”底下又有若干“話”，“話”底下還有“音”的差別。他們最近感到閩海、閩中、閩客三者並排不妥當，為了從大處着眼，聯系整個漢語方言的系統，才又放棄了三“群”的提法，在最高一層的分區上只分為“閩方言”和“客方言”兩片，但是問題也還沒有完全解決，到了第二層，閩方言下應分幾種次方言呢？大家的意見不大一致，最突出的分歧集中在莆仙這一支上面。莆田和仙遊這兩個縣地處閩東閩南之間，從語言特點和人文歷史兩方面看來都頗具有特殊風格，就“語感”而言，它既具閩南特色又兼有閩東的特色，這確實使人左右為難。在這種情況下，咱們只能鄭重其事，以語言現實為基礎而結合方言歷史及人文歷史來全面權衡，不宜於輕率下結論。咱們不能夠過多地从兩個縣人口只有一百五十萬左右，通行地域又不廣這些方面來考慮問題，這樣的考慮是不能導致問題的科學解決的。前面說過，方言的分區是客觀存在的，地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對於方言系屬的確定不能起多大的作用。如果把人口數字和地域狹窄作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那麼，“方言島嶼”這一概念就難以成立了。大家都知道，通過近幾年

的方言調查，人們陸續發現一些漢語方言中的“島嶼”，像福建南平城關的“土官話”和長樂洋嶼的“京都話”，還有廣東海南島崖縣的“軍話”，就都是屬於閩方言包圍中的北方方言島。這些方言島保管人口少、地域小，可是由於它們在語言特點上和歷史淵源上都與周圍的方言迥然不同，語言工作者終於不能熟視無睹，只好承認它們是處在“方言島”的地位。莆仙話的歸屬問題當然不同於方言島的問題。從現有的語言材料看來，莆仙話可能早期是以閩南方言為基礎的，後來受到閩東方言的影響，因而逐漸形成一些閩東方言的特點，使得它模稜兩可。如果這樣的設想合乎實際，我們在進一步深入調查的前提下，就應該從發展的趨勢來多加考慮：如果莆仙話向閩東方言靠攏的發展趨勢不至於動搖其原來的閩南方言的基礎，那就可以不必斤斤計較個別語言因素（例如莆仙話有邊擦音，而閩南方言沒有），而把它歸到閩南方言中去；反之，如果從語言的現狀和它的發展趨勢來看，莆仙話受閩東方言的影響極大，受閩東方言同化的因素越來越多，以至於淹沒了原有的閩南方言的基礎，那麼，咱們就應該實事求是，把莆仙話歸到閩東方言中去。除此以外，第三種結論——獨立一支的可能性也還是存在的。那就是當咱們深入一步全面研究了各方面的情況，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說明非獨立成系不可的時候，咱們就只能讓它獨立一支，和閩南、閩東、閩北、閩中平起平坐。像莆仙話這樣的情況的確是對咱們方言工作者能否迎接困難、克服困難的一場考驗，不過只要咱們掌握原則，面對現實，細心地分析問題，反復地進行討論，最後總可以得到比較能令人滿意的結論的。

總而言之，不論遇到怎麼樣的複雜現象，只要咱們既充分依靠語言材料，又不撇開人文歷史；既從語言現狀出發，又不忽略發展的趨勢，用認真嚴肅、一絲不苟的態度來處理問題，就完全有可能解決一些出現在漢語方言分區中的棘手問題，對於前人分區中不盡合理的地方，也就能夠作出科學的修正。根據這樣的精確，像客家方言和贛方言的關係問題，某些地區方言應否重劃一區的問題（如皖南徽州一帶方言，鄂、贛、湘接境地帶的方言）等等牽涉到整個漢語方言系統的新老問題，都可以在開展深入調查的基礎上加以科學的解決。

四

語言材料既然是方言分區的主要依據，咱們如何正確地運用語言材料，以達到科學分區的目的呢？

語言是語音、詞彙、語法三要素組成的整體。在給方言分區找依據時，原則上應該三者兼顧，全面利用，不宜乎只取其一面捨棄其餘。斯大林同志說：“地方方言，是替人民群眾服務，並且有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1]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是語言的特點的本質，在語言發展中是最穩

[1]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漢譯本 43 頁。

固的，因而咱们在比较方言材料时，不能不留意到在基本词彙和語法構造上所表現出來的特点。

划分方言时要兼采語音、詞彙、語法三方面的材料，这不等于說在实际工作中不能够根据具体的情况而較多地运用某一方面的材料。如果某一語言中的方言差異主要表现为語音上的分歧，那么，咱们自然可以更多地从語音上來观察客观存在的方言分区；同样，如果另外一种語言中的方言差異主要是从語法的分歧或詞彙的分歧上表現出來，咱们自然也可以多考虑通过語法的特点或詞彙的特点來归納不同的方言。这种从实际出發而偏重于某方面的語言現象，不能看作是違背了全面兼顧的原則。事实上，各种不同系屬的語言，在处理方言分区的问题时，所依据的語言材料总难免会偏重于某一方面的，恐怕很难找到一种語言，它的方言差異表現在語音、詞彙、語法三个方面是完全平衡的。拿印欧語系的某些語言來說，例如俄語、德語，尽管它們的形态比較發達，語法結構跟語音的关系十分密切，因而往往可以通過某些語法和語音相結合的語言材料來划分不同的方言，但是从語音、詞彙、語法三个方面來看，方言之間的差異主要还是表現在語音方面。汉语的情况跟印欧語系的語言比較起來，方言間的差異性表現在語音方面还要顯得更加突出，而詞彙、語法方面的共同性的一面却相对地要占有更大的比重。这样的实际情况使得我們在运用語言材料划分汉语方言时，既要注意到語音、詞彙、語法的綜合利用，同时又不能不适当地側重語音方面的特点。側重当然不等于偏廢，多运用語音材料更不等于排斥詞彙和語法的材料。事实上当咱们对不同系屬的汉语方言加以科学的闡明时，咱们总是比較容易地从語音材料中找出一些可以依据的条目來，这跟汉语語音的結構比較謹嚴，系統性特別强不无关系；而在詞彙和語法方面，要找出一些条目來使人看出方言的界綫，那就比較困难了。拿詞彙为例來說，当咱们在粵方言中接触到“行”这个古詞仍然在口語中作为“走路”的意思而被广泛运用的时候，咱们可能一时認為这个詞是粵方言独有的；可是，当咱们再接触閩方言和客方言时，咱们又会發現在閩、客這兩大方言中同样也保留着这个古詞的用法，这样一來，咱们又不能不推翻原先的結論了。諸如此类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总之，汉语詞彙方面的材料，能够作为方言分区依据的，比起語音來要少得多。

在綜合运用語音、詞彙和語法材料的情况下，咱们还應該注意另外一些对咱们划分汉语方言極有价值的語言材料。例如在閩方言中，閩南話一般說來文白異讀比較丰富，几乎形成各自成系統的“双軌”局面。这一点对于咱们把閩南話独立成为一个次方言，就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又例如以福州为代表的閩东話，存在着声母类化这一与众不同的語言現象，这对于咱们把閩东話独立成为一个次方言，自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汉语各地方言，很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綜合性的語言特点，它們綜合地反映了某一方言、次方言或土語的語音、語法、詞彙方面的特色，廈門話的變調和輕聲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咱们今后在調查方言时有必要多注意發掘这一类綜合性的特点，并使这

[1] 參看李如龍：《廈門話的變調和輕聲》一文，《廈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62年第3期。